

从先师到德育家

——《教育世界》时期罗振玉的孔子观及日本影响——

张 子 康

From “Xian Shi” to Moral Educator:

Luo Zhenyu's View of Confucius and Japanese Influ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World of Pedagogy*

ZHANG Zikang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end of traditional feudal educatio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estern-style education reform had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the status of Confucius, the former sacred tutor, inevitably declined. As a pioneer of education reform, Luo Zhenyu had to rethink Confucius' position in culture and education. By learning from Japanes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works, Luo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us from a traditional “Xian Shi” to a modern moral educator. He combined the “expert” Confucius with the “sage” Confucius, so that Confucius not only retained the traditional respect, but also obtained the modern identity to adapt to the trend.

Keywords: Luo Zhenyu, the view of Confucius, *world of pedagogy*,
Japanese influence

关键词：罗振玉、孔子观、《教育世界》、日本影响

序言

早在《教育世界》创刊之前，罗振玉已创办有东文学社开始其教育实践，后因《农学报》和东文学社取得的成绩，得到张之洞的赏识，被聘任为湖北农务局总理，整顿下属的农务学堂，并很快取得成效。由此，罗振玉的注意力由农学逐渐转移到了教育上，他以《教育世界》为阵地，引介日本的教育经验，撰文为教育改革出谋划策，并访问日本实地考察教育情况，还得以参与主持地方教育事务，实践其教育构想。罗振玉力主效仿日本、提倡译书、重实业、兴师范、推行女子教育，在清末教育界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但，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的罗振玉，毕竟无法割舍自幼苦读的圣贤书，在推行新式教育的同时，他也思考着如何保存传统教育中对于孔子及孔学的尊崇。

传统教育以孔子之道为纲，旧式的官学、书院、私塾教学大都不超出四书五经范畴。然而，随着传统封建教育与科举制度的穷途末路，西式教育改革已成必然之势，作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地位不可避免地随之下落。尤其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孔子的异见正在积聚，过去牢不可破的孔子观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圣人之尊也早不比往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罗振玉意识到孔子之教显然不能如过去一般统摄所有的教育内容，一方面，孔子需要从封建文教中一定程度地挣脱出来，换以新的面目，但另一方面，孔子又需要代表经学教育传统在新式教育中尽可能地占据重要的位置，那么孔子在改革后的文教体制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能够兼顾新旧之交的种种问题呢。

让罗振玉等“中体西用”思想根深蒂固的文人感到幸运地是，作为教育改革蓝本的本国已然寻找了到一条可行之道，使得孔子及儒学依然在近代国家的思想文化教育中依然能够占据相当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原有的尊隆。罗振玉对于日本经验的借鉴与效仿，正展现了力图保持民族“精粹”的学者的努力，寻求孔子现代性转换之道，以回答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

一 罗振玉的德育思想与尊孔

作为清末教育家的罗振玉始终表现出坚定地尊孔立场，这在他撰写的文章与教育活动中均有体现，不过细加考察的话，能够发现从1901年到1904年间其尊孔的内涵存在着变化：罗氏对于孔子的尊崇，从固守传统儒家正统，逐渐加入了更多的现代教育文化的视角与内容。

1901年罗振玉在刚刚创立不久的《教育世界》的第6、7号上刊登有《论语讲义》，文中称：“孔子为亚洲第一教育家”“宣圣为教育家山斗”¹⁾，有意强调孔子作为教育家的身份，不过罗氏只是在名头上将先师换做近代语境中对应的教育家，这一身份并没有什么新的内涵，也并没有真正明确在新的教育体制中孔子的位置。但这透露出罗振玉在参与教育改革之初就在思考孔子在新式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问题。

为了保存孔子在文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罗振玉还一度支持康有为的“孔教”说，与《论语讲义》几乎同时发表的《教育五要》的第二条为：“须知教育当用本国宗教及语言文字”，强调“今中国宜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国各教若不碍法令，得自由崇奉，但不得喧宾夺主。”²⁾同在此文中，罗振玉已经明确提出教育应最重德育，因此“修身为教科之首要”，而培养国民的德行的具体内容不出儒家传统道德观念：

凡培国民之德行不外二者，一曰私德，一曰公德。私德者，修身励行以美一身之谓也，公德者谋公共之利益以民物为胞与，已达达人，己立立人之谓也。其在今日公德尤要，故一切学科当以修身为首，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³⁾

但罗振玉此时将孔子视为宗教教主，毕竟未将德育与孔子之道联系起来，可见他还缺乏此方面的自觉意识。

1) 罗振玉《论语讲义》(《教育世界》，1901年第6号)，第1-2页。

2) 罗振玉《教育五要》(《教育世界》，1901年第9号)，第1页。

3) 罗振玉《教育五要》(《教育世界》，1901年第9号)，第2-3页。

不过时隔半年，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罗振玉在《教育赘言八则》中开始较为系统地论述德育与儒家道德学说的关系。罗振玉批评中国过去的道德教育并不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不懂得照顾儿童的接受程度及循序渐进之理，因而新式德育也决不能完全照搬已往，由此他提出了适应教育对象的德育构想：

其实今日各国教育最重德育，其修身诸书多隐合我先哲之遗训；但必相儿童之年龄为深浅之程度，不似我之以极高深之圣训，施之极幼稚之儿童耳。夫令儿童读极高深之圣训，是何异陈光施于盲人之前，奏九韶于聋者之侧，道则高矣，其如程度不合何？迄年岁既长，知识日进，则又将幼时所读之圣训弃髦弃之，而专力于所谓制举文字，故中国名为尚道德教育，其实则否也。今宜从世界各国公用之学科，不加增损，而以先圣遗训别入中等以上之道德教育，而先剌取其精义为浅语，编高等小学国民读本，以授幼学，不当仍袭从来不考程度但取高深之习惯矣。此事于学科中关系最重，故详言之。⁴⁾

罗振玉认为各科教材基本皆可以先译自外国书，唯有修身科的教材仍需采自儒家经典，但要针对教育对象的接受能力进行不同的处理，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要编纂通俗易授的德育读本，中学以上再直接读经。所谓“先哲遗训”自然尤其指的是孔子学说，不过这种变化只是形式上的，而其内容即为“圣训”又合于各国修身之书，自然无需改易。继承如上观点，罗振玉随后在《学制私议》提出：“将‘五经’、‘四子书’分配大、中、小各学校，定寻常小学第四年授《孝经》、《弟子职》，高等小学校授《论语》、《曲礼》、《少仪》、《内则》，寻常中学授《孟子》、《大学》、《中庸》，并仿汉儒专经之例，专修一经。其余诸经为高等及大学校研究科，不得荒弃，以立修身道德之基础。”⁵⁾实际就是将原来的四书五经及《孝经》等书按照难易程度作为德育的教材分配到不同层次的教育中，并完全将儒家经典与德育相绑定。不过此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儒教或孔教的构想，仍提出教育需：“守儒教主义，使学与教合一。（他宗教皆主神道福利之说，故宜教与学分。儒教主伦理致用，故宜学与教合。）”⁶⁾

直到1904年，罗振玉在《孔子传略》中彻底否定了孔教说，更为明确了孔子之教的德育属性：“孔子之教人也，以六艺，盖综合知德体三育而一贯之，而尤重德育。”⁷⁾刊登在同一号的《公德私德辩惑》提出“道德者古今中外之所同无二致”⁸⁾，公德、私德皆为中国固有，孔孟的道德学说与现代欧美教育家所言无异，换句话说，中国孔孟道德不仅与时代发展及新式教育不悖，并且完全可以替代西式的德育。

1904年罗氏任江苏师范学堂校长，每月初一及十五率诸生对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其后罗氏支持祭孔升为大祭、在新学制中提倡保存国粹、力主读经等等。这些尊孔的行动表面上看来与此前并无不同，但其尊孔的内涵确实存在着变化。此时的罗振玉已然明确了从德育的角度确立孔子的地位与身份，由此，罗氏的尊孔不仅仅是出于传统儒家本位思想以及“保存国粹”之说，也并非只是将孔子作为传统偶像、儒学的化身加以崇拜，更不是将孔子奉为教主，他是基于新式教育的视点，认为孔子既是古今不易的大教育家，孔子之教还是教育之首——德育的根基。

4) 罗振玉《教育赘言八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

5) 罗振玉《学制私议》，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6) 罗振玉《学制私议》，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7)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1页。

8) 罗振玉《公德私德辩惑》（《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1页。

罗振玉以尊孔为核心的德育思想，自然是当时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体现，但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保守复古，实际上这是对于邻国日本教育经验的效仿。将孔子视为新式的德育家，也并非罗振玉自发产生的念头，其背后是日本的研究与理论作为支撑。罗振玉在1902年初开始将孔子之教与德育紧密联系起来，其契机无疑是东渡日本的教育考察，此后又在日本具体的教育与学术成果的影响下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此种观念。

二 东邻的德育家孔子

日本明治时期，在强劲的欧化风潮影响下以至于“全盘西化”之说在日本甚嚣尘上，引起了儒教、国粹主义的反弹，尤其集中在国民道德与教育领域，由而出现了所谓的“德育之争”。最终，在元田永孚等人的推动下《教学大旨》《教育敕语》以天皇的名义先后颁布，宣告了保守派的胜利，以儒教为基础的国家道德体制得以确立。相对于1879年颁布的《教学大旨》露骨地宣称：“自今而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⁹⁾《教育敕语》则更巧妙的将儒教的道德学说融汇其中，不过其精神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德育之争”的代表人物西村茂树（1828-1902）在1886年发表了《日本道德论》提出了一种采儒教、哲学精粹的日本道德学说，在政学两界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实际是一种换上西学新衣或者说补充进部分西方哲学的儒教主义，这表明以儒教为基础的道德论以及“德育”观成为明治中后期一股强大的风潮。就在《教育敕语》颁布前不久，西村茂树在提交给文部省大臣的谏言书中说：“在今天的我国，建立道德教育的基础应该不难。自两千多年前《论语》在应神天皇时传入我国以来，教育史的精髓除儒道外无它物。（中略）如果传统教育在明治初期没有遭到破坏，今天的教育家也不会迷失道德教育的方向。因此，从我们祖先的时代起造就了日本人民道德的儒道，即使我们试图抛弃它也不可能抛弃的。尤其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在下官看来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教诲。因此，在今日以儒家典籍确立道德教育的基础，诚为理所当然之事。”¹⁰⁾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儒教主义者的心声。

1901年11月罗振玉受张之洞、刘坤一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此时他所接触到的日本明治后期的教育界，正弥漫着崇尚孔子之教的气息。在日本两个月的时间，罗氏考察了东京、京都的多所学校，并和嘉纳治五郎¹¹⁾、伊泽修二¹²⁾等日本教育家进行了交流。伊泽修二对罗振玉说：“今日不可遗忘乎道德教育，将来中学校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被罗氏认为“其言极有理”。¹³⁾罗振玉还拜见了“主道德”的杉浦重纲，买到了《青渊先生六十年史》，青渊即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涩泽极为崇奉孔子，

9) 奥田真丈監修『教科教育百年史・資料編』（建帛社、1985年）、42頁。

10) 西村茂樹「榎本穩歩大臣へ建言」、日本弘道会編『西村茂樹全集増補改訂』第4巻（日本弘道会、2004年）、344-345頁。

11) 嘉纳治五郎（1860-1938），日本近代教育家，体育家，从1893年到1920年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筑波大学）校长，而明治时期汤岛圣堂释奠废止后，正一度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管理。

12) 伊泽修二（1851-1917），日本近代教育家，1875作为公费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师范教育，归国后任东京师范学校校长，1895年到1897年担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

13) 罗振玉《扶桑两月记》（教育世界社，1902年），第8页。

喜好《论语》，后来以“《论语》加算盘”说闻名。

罗氏此行尤其和嘉纳治五郎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东京高等师范校长加纳（治五郎）为讲教育大意一星期，每日一小时，意甚挚然，所言皆所夙知者。”¹⁴ 嘉纳治五郎是日本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并且受西园寺公望委托从1896年起开展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也极为关心。嘉纳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道德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并主张保存国粹，将尊孔崇儒融汇到现代的道德教育之中，1903年他召集弘文学院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速成师范班”的毕业生开会，并发表演讲：

中国言德育，所取者孔子经训而已。但孔子之经训，活用之则为国家文明之要素，死守之则为糟粕之陈言。趋入二十世纪文明之世界，而但取口舌间之伦理与模范上之观念，以装点门面，并不足以应无方之世。……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为教育。然其所以活用之方法，则必深明中国旧学，而又能参合近世泰西伦理道德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定其规律。¹⁵

由此可见，嘉纳的德育思想大抵也是以孔子之教为基础，以西方伦理学说为补充，此德育思想正合罗振玉原有的教育理念，所以罗氏称其“所言皆所夙知者”。与罗振玉交流最多的嘉纳与伊泽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1907年成立的“孔子祭典会”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嘉纳被推选为委员长，曾受教嘉纳的鲁迅就回忆嘉纳要求中国留学生前往汤岛圣堂祭拜孔子。因而罗振玉虽然未将两人的交流一一记录在案，但必然会与嘉纳交换关于如何应用孔子德育思想的意见。

总之，罗振玉在日所遇、所见、所听、所读，无不宣告着德育的重要性，以及孔子圣训正可为德育之基的道理，这无疑强化了他原有的尊孔的立场，并启发他从德育的角度树立孔子在新式教育中的权威。所以罗振玉的关于尊孔、德育、修身等方面的提议，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儒教主义道德教育的模仿和移植。

三 《孔门之德育》

1901年罗振玉在《论语讲义》中对“学而时习之……”及“性相近习相远”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前者解释为“学问以谋普及为第一义”，后者消弭“性善”“性恶”之争，归为“皆在勉学”及“教育之重要”。第6期《论语讲义》后附有小字说明撰写此文的用意：

宣圣为教育家山斗，中国家有其书，人诵其说，而顾昧于其义。盖由于幼稚之年不通文理，昧然目诵，及既成长，又溺于制科学而不思，一二考据家又仅知辨析训诂之毫分，较量家学之同异，以至圣学似明而实晦，似存而实亡。兹将中国古来教育家说一一诠释，辞取浅近，冀广闻知而维正学，而先自论语始，案期付梓以质之海内学子，倘有取乎。振玉并识。¹⁶

14) 罗振玉《集蓼编》，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15) 《日本宏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演说》（《湖南官报》，1903年3月8日第307号），论说。

16) 罗振玉《论语讲义》（《教育世界》，1901年第6号），第2页。

可见罗振玉根据当时教育改革的目标对孔子教育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发挥，罗氏虽然展现出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兴趣，但当时孔子的德育思想还并非他关注的重点，而是附会以西方的教育理念，借孔子之口宣传义务教育思想。不过，之后授人翻译《孔门之德育》，体现了罗振玉关注点的转变。

《教育敕语》颁布之后，孔子的教育思想重新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孔子在大量的教育学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专门的研究论著也接连出现，如：远藤秀三郎的《作为教育家的孔夫子》、汤本武比古的《孔子五段教授法》、亘理章三郎（1873-1946）的《孔门之德育》（这三本著作都在清末翻译到了中国）等等，通过这些论著与近代国家相适应的教育家孔子的形象建立了起来。这些著作除了利用西方教育学重新阐释孔子的“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循循善诱”等教育理念外，尤其重视对于孔子“德育”思想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亘理章三郎的《孔门之德育》，此书系统总结了明治时期孔子德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从书前有井上哲次郎、西村茂树、加藤弘之、嘉纳治五郎四位当时德育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的序言，即可看出学界对《孔门之德育》的重视与认可，西村茂树称赞其“能揭出正教，而发其光辉”¹⁷⁾。

亘理章三郎这位日后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权威，在1901年《孔门之德育》出版时还是一个学术界的新秀。《孔门之德育》共十五章，附录有“孔子略传”及“孔门诸弟子传”，此书从孔子作为德育家的资格、孔门的师徒的关系、德育的目的、知情行的德育、德育的教材及场所、德育的结果等全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孔子的德育思想与实践活动，并且能够为实际的道德教育提供参照、指导。

亘理章三郎热情地赞颂“德育为人类最神圣的事业”，而作为千古圣哲的孔子从事德育“留下人文历史上最光辉的记录”。¹⁸⁾ 亘理在书中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德育家”孔子的形象，他充满慈爱之情，以其人格的感化力润泽弟子，对教育充满热诚，尽其一生于教育事业，有着最伟大的教育精神。在孔子的精神的感召下，孔门师生之间拥有最善美的关系，学生悦服、尊敬其师，孔子则以和容、谦逊对待弟子，令后人无限追慕。

孔子的德育法也可谓完美。孔子的德育以培养实行进善、志于正道的士为目标，始终贯彻“诚”的精神；孔子运用诱导启发、因材施教两大方法，知的教导、情的感化、行的示范三者并行，相辅相成；诗歌、典籍、历史、音乐乃至社会自然都被孔子运用为德育的教材，而整个人世自然更是孔门的教坛，可谓化天地万物于德育中。最终达到了“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的成就，并且孔子德育的伟绩不限于一时一地，亘理宣称孔子之教作为“东方文化的中枢”具有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两千四百年，世运变迁，全世界越加景仰夫子。今日如此，将来亦将如此。”¹⁹⁾

《孔门之德育》全文翻译刊登在《教育世界》39期，此后又《教育世界》社又刊发了单行本，可见罗氏对于此书的看重。此书的视角之新颖、结构之完善、研究之深入、方法之融通，显然领先于当时中国学界很多。在《孔门之德育》的启发下，罗振玉对于孔子的德育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大德育家”的孔子形象与思想在罗氏的思想中被更为清晰、具体地建构起来。

罗振玉通过实地考察以及接触日本的研究成果，真切地感受到邻国对于德育的重视，以及孔学对于培养国民道德的效用。固有的立场使罗振玉更为认可日本模式，日本模式又反过来强化了他的这种信念。日

17) 西村茂树「序」，亘理章三郎『孔門之德育』（開発社，1901年），1頁。

18) 亘理章三郎『孔門之德育』（開発社，1901年），1頁。

19) 亘理章三郎『孔門之德育』（開発社，1901年），129頁。

本成功的范例，使罗振玉认识到孔子并非僵化的先师，而是新时期的大教育家，尤其孔子的德育完全可以在新式教育中占据首要的位置。作为现代德育家的孔子在罗振玉心中确立起来，也使其越加坚信圣贤道德与儒家修身对于现代教育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孔子的现代身份

1904年《教育世界》第73号特别增有附录一栏刊登了罗振玉的《孔子传略》一文，此号首页还载有“至圣先师像”以配合此文。这篇《孔子传略》未见有研究者论及，罗氏相关文集中也并未收录，然而将其放在近代中国孔子研究和评孔史上来看，却是一篇有相当意义的文章。在此文中，罗振玉借助日本的理论资源，不局限于教育，较为全面地对孔子进行了论述，并着重定义了孔子的现代身份。罗振玉撰写此文用意，要结合当时评孔论战爆发的前夜这一特殊的思想环境来看。

1904年1月近代教育制度奠基作用的“癸卯学制”颁布，新学制尤其注重“德育”与“尊孔”以保存“圣教”，作为新学制的重要参与者，这一结果显然是符合罗振玉心意的。罗氏趁着新学制的颁布展开孔子研究，正与《教育救语》颁布后，日本学者发表孔子研究论著相类似。

然而“新学制”并没有能阻止孔子地位的下滑。1901年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时，中国知识界对于孔子的批判还是一股涌动的暗流，然而仅仅三年后排孔之声已然渐起，巍然耸立两千年的孔家店显现出“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罗振玉显然察觉到了评孔风潮的临近（章太炎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订孔》篇仅两个月后就在日本出版了），故而辨析孔子的现代身份以回应积蓄中的反孔势力就显得尤为紧要。

《孔子传略》的主要用意在于辨析孔子的身份。罗振玉将孔子的学术分为伦理政治教育三者，故而孔子“为伦理家、为教育家、为政治家、为哲学家，无不可”。伦理方面，由于身处乱臣贼子的时代，故而孔子着重于忠孝之说，为臣子立论，以挽救时弊，但孔子真意实际在于“两方交尽”，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彼后世专责臣子一面，以为孔子之教如是者，此所谓胶柱而鼓瑟，于圣人之意失之弥远矣”²⁰⁾；政治方面，孔子集诸王大成，“鉴古酌今”对于先王政治有所选择、损益，孔子施政“先教后刑”，“养教兵”²¹⁾三端并行不废；教育方面，“孔子为二千年来民间教育大家”，尤其注重德育，善“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其教人以“伦常日用为先，而性与天道为后”²²⁾。可以看出罗振玉对于孔子的学说进行了符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进化论等新思想的诠释。

罗振玉同意将孔子看做是伦理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但同时重点反驳了将“宗教家”、“博物家技术家”、“政权家”的头衔加在孔子头上。

罗振玉在两年前所写的《教育五要》等文章明确支持作为宗教的“孔教”，并倡议以“孔教”为国教。而在《孔子传略》中则反对将孔子视为宗教家，关于此点转变，一方面可能受梁启超“叛教”后反孔教的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与日本的影响有关。当时日本道德论者及儒教主义学者大多不将儒教看做是宗教，认为孔子之教乃是一种德教并非宗教，并对基督教等宗教进行攻击，井上哲次郎就是其中的先锋。值

20)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0页。

21)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0-91页。

22)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2页。

得注意的是《扶桑两月记》里记载有长冈护美对罗振玉说“宗教有害于教育，西人中耶稣教士，及东人中之本愿寺僧在中国设立学堂，均不宜优待。”²³⁾ 罗振玉虽不一定当时即接受，但记录在书中，显然已受到影响，埋下了日后转变的种子。罗振玉在《孔子传略》中扬道德贬宗教，认为宗教“诱导愚氓”“坚人之迷信”²⁴⁾，自然孔子之教就不可能是宗教，应该说是这是在日本道德学家影响下的修正。

罗振玉特别辨析了“政权家”与“政治家”的不同：

两汉以来国家之于孔子锡爵追赠，崇隆已极，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但观其所以褒赏之故，无非欲利用孔子教忠教孝之说而尊其政治无上之权力。不知孔子虽以救当世乱贼故而著书，于教臣子之说特详。然非谓君父之道可不尽，是以大小戴记所记孔子论君父之道亦复详备，彼后代君臣如汉高、叔孙通辈，乃借儒家之说以尊政权。致近日浅薄之学子，遂横议孔子为君权党之魁硕，岂非迷惑之甚者哉？²⁵⁾

此处再次强调孔子并非为君权专制立说，其真意在于上下关系各尽其责，不过被后代君臣利用以维护其统治而已。“君权党之魁硕”之说可谓当时孔子遭受最大的非议之处，关于此点的辩证在近代评孔论战中不绝于耳。

罗振玉反对将孔子视为“博物家技术家”，一方面是所谓“君子不器”，“体”与“用”，“道”与“术”的高下分别的固有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孔子之道发挥作用的领域有了明确的认识，以西方的学科观念将孔道圣学限制在哲学、政治、教育等人文社会学科中，而不再是过去无所不包，囊括了世间所有真理的了。

罗振玉否定孔子为宗教教主、专制主义思想的罪魁祸首，同时也规限了孔学的范围，实际上不仅回应了当时中国的孔教与批孔两大势力，也对死守传统圣人观不加变通的腐儒以及“西学中源”等严重落后时代的学说的批判。而罗氏的立足点是近代日本儒教界构建的孔子形象，其论点与辩词都可以在日本明治后期孔子研究的论著中找到源头。

将伦理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的头衔加之于孔子，在辨析了合适的现代身份后，罗振玉在文章最后一段又回归了无上的圣人之尊：“综而论之，孔子为亚洲古今第一大圣哲。故其所学，于教育、于伦理、于政治，无不兼容并包，各究其极。”并以元代加封孔子的《大成诏》作为结尾：“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道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洵知言哉。”²⁶⁾ 可以看出，罗振玉努力将孔子的现代身份与传统的无上尊崇合一。

23) 罗振玉《扶桑两月记》(教育世界社，1902年)，第14页。

24)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5页。

25)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5页。

26) 罗振玉《孔子传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73号)，第96页。

结语

罗振玉最为关注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德育思想，这无疑与罗氏当时的职务及参与清末教育改革有直接关联，作为德育家的孔子也正是在效仿日本教育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从根本上来说，罗振玉力图维持的是孔子原有的“圣人”的地位，趋时的新头衔不过为孔子披上了一层光鲜时尚的外衣，为不可改易孔道圣学保驾护航。虽然如此，这些新式的种种身份意味着要将孔子思想，以西方的学科体系分门别类，并以现代的眼光加以诠释，这不仅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传统的藩篱，也无疑也会带来内质上的改变。

晚清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罗振玉等新旧参半的文人不得不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孔子，作为重要知识来源的日本已有较为成熟的诠释话语，在选择性的接受日本成果的过程中，也正展现了他们对于孔子现代身份的观点。最终从日本传来的尊孔及德育的思想，通过罗振玉等人在实质上影响了学制改革，推动了清末教育宗旨中“尊孔”这一核心思想地确立，这是日本孔子观在中国发生影响的重要一例。

